

· 国外人士看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 ·

编者按：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擘画未来五年中国发展蓝图，对于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国外人士对此表现出高度关注，就中国“十四五”规划取得的成就、“十五五”规划的任务目标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借鉴启示和全球意义等问题展开详述。现刊发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豪尔赫·阿尔贝托·科雷伊内斯，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站创始人胡里奥·里奥斯，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原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办公室高级顾问埃利亚斯·贾布尔等人相关文章，以供广大读者学习参考。

中国“十五五”规划对拉美的辩证启示

[秘鲁] 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诚如全会报告所言，“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①。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成功克服了挑战，在经济、社会、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新的巨大飞跃，综合国力得到增强。如今，“十五五”即将启航，而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危机。在此历史性的交汇点上，一个核心问题便凸显出来：中国的治理模式为何能不断取得成功？其在日益动荡的国际格局中稳步向前的“密钥”究竟是什么？

一、中国成就的治理哲学：规划的辩证法

中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巩固国家实力的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当前，资本主义的衰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崛起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遥想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多少人鼓吹“历史已经终结”、宣告“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然而，仅仅30年后，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重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页。

塑世界版图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图景已然改变！

众所周知，成功并非天赐的礼物，而是一天一天奋斗出来的、一砖一瓦建设出来的。而对于一个人口如此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份任务的艰巨性更要比其他国家多上数倍。因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面临的历史使命并非（如某些国家那样）延续或完善既有之物，而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切从零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前行，去构建一个崭新的秩序。

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漫漫长征路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规划”作为一种治理哲学的核心，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为经济和国家运行指明方向，同时赋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规划与市场”的辩证统筹，正是中国治理哲学的精髓之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中国经验所证明的，规划与市场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且相辅相成。这是通往成熟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奉，在于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承认，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持。

这一治理哲学，还体现在“战略远见”与“系统思维”的统一。中国的独特优势之一在于领导层具有战略远见。在一个不稳定、无序、复杂、战争阴云密布的世界里，这一点尤为重要。而这种“战略远见”又植根于“系统性、整合性思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特质。它能够将事物视为整体，看到其联系与中介，把握其发展与变化，并坚持真理必须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十五五”规划的制定，正是这种治理哲学的最新实践。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国际局势进行综合评估的结果。其未来五年的路线图已经绘就：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并统筹发展和安全。现在，中国必须在一个高度冲突和技术巨变的外部场景中，协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回答那个根本性问题——“为了谁”。答案不言而喻：是为了14亿多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去完成“十五五”这项全新的历史任务。

二、中国治理的“压舱石”：领导核心与战略定力

中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宏伟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它要求具备系统思维、明确目标和坚定方向；最重要的是，它要求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动员、组织并发挥人民群众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能力、创造性和历史主动性。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担此重任？

首先，在于其拥有科学的理论指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与生命力源于“守正创

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其次，在于其是在斗争中锤炼出的、具备独特品质的政党。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具有的一系列品质和特征，例如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完善治国理政基本方略，从经验中汲取教训，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科学预见未来发展趋势等，使其能够以智慧、战略眼光和高度创造性来治理国家，那是因为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想信念、坚持人民至上。因此，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正是中共领导核心作用的集中体现。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中享有的巨大政治和道德权威、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深厚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腐败（这一侵蚀社会有机体的真正毒瘤）的无情斗争，这一切的成就便无从谈起。

最后，在于其拥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决心与机制。一个国家，即便拥有社会主义这样优越的体制，但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再优越的体制也是空壳。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化了这一保障。全会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要“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①。这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

三、来自南方的镜鉴：拉美的挑战与启示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拉美的向往社会主义的人而言，上文对中国治理哲学与领导核心的深入剖析，为我们解决自身累积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当然，这不是模仿，而是参照。

一般来说，拉美社会发展深受“短期主义”的掣肘，政治精英与活动家普遍目光短浅，耽于即时利益。这种“短视”治理导致我们严重缺乏一种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并由中国共产党以最高形式展现出来的核心特质：战略远见。

如果说有序、规划是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那么无序、混乱才是拉美的常态。拉美国家并未将“规划”视为一种必要的管理工具，“短视主义”、即兴而为和政治不稳定占据主导；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与无处不在的腐败，更从根本上侵蚀了长远规划的生存空间。换言之，在无序或混乱中谈长期规划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以秘鲁为例，治理方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过去十年我们经历了六届政府，近四年更换了超过120位部长。包括左翼在内的政党也未能幸免。这是社会处于持续危机状态的根源之一，是政党脆弱性的根源，也是无法利用现有优势、确定优先事项和保证连续性的根源。

这种“短视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规划的“空转”与“流产”。21世纪初，秘鲁国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1页。

会中有代表的政党及工会组织签署了一份《全国协议》，但该协议的各项规划仍停留在纸面上。2010年批准的《秘鲁2021年规划》和2022年批准的《秘鲁2050年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结果亦是如此，都成了“纸面规划”。可见，仅拥有政府计划是远远不够的，执行计划的决心更为重要。在中国，规划是蓝图；在秘鲁，规划则沦为一纸空文。这种“言与行”的巨大反差，其结果天差地别，足以令秘鲁人民深感痛心！

那么，我们这些拉美国家的出路何在？我们这些拉美共产党又该做些什么呢？答案是，至少我们应该向中国共产党学习如何“规划”。

基于科学的规划，本不应与我们这些政党及其国家发展观相去甚远。但这需要我们彻底改变政治中根深蒂固的“自发主义”观念——那种仅仅满足于社会运动和在资本主义体系所容忍的逻辑内活动的想法。那样一来，占主导的永远是紧迫事务、局部要求、即兴而为。结果便是可预见的失败。

诚然，我们这样处于政治反对派地位的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执政大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规划”只有在党执政时才有价值。我们需要将“规划”这一工具运用于我们当前的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中。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有利条件统筹我们的力量以确保最大潜力，确定优先事项并集中力量办大事。总之，我们必须将这一切理解为“未来执政的准备”，秉持着“如果能把小事管好，就能把大事管好”的理念，从而为最终的胜利奠定基础。

[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 (Alberto Moreno Rojas) 系秘鲁共产党 (红色祖国) 主席；译者楼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康晏如]

中国“十五五”规划、拉美“第二次独立” 与全球南方联合自强

——从地缘政治视角解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

[阿根廷] 豪尔赫·阿尔贝托·科雷伊内斯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此次全会迅速成为国际热点。或许有人会问，一次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和远隔重洋的拉丁美洲有什么紧密关系吗？事实是，这种“远隔重洋”的地理概念早已被地缘政治的紧迫性所取代。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通过中拉论坛、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曾经被辽阔大洋阻隔的拉美和中国，关系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贸往来。2025年5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中拉合作“五大工程”，更是标志着双方的共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中拉关系开启全新阶段。因此，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寻求“第二次独立”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十五五”规划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内事”，其中蕴含的新方向，也是“南方国家的事”，因为它为我们摆脱旧有依附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契机。

一、拉丁美洲“第二次独立”的未竟之路

在拉丁美洲，抗争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命运。我们在19世纪进行了“第一次独立”。彼时，以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人为代表，通过武装斗争，使拉美各国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旧殖民主义统治，实现了政治独立。然而，胜利是如此之短暂。19世纪末至今，我们又被迫开启了寻求“第二次独立”的漫长抗争。这片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大陆，却在经济、金融、军事和文化上又陷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这场新的抗争，其目标是实现真正的经济主权、文化自主和政治自决。

“第二次独立”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主动的地缘政治设计。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深受外部依附与内部掣肘的双重束缚。我们所拥有的富饶“共同产品”（即自然资源），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说中被异化为“富饶的诅咒”。拉美地区被牢牢地定位为服务于“美国生活方式”和“军工复合体”的“战略后院”。资本为了300%的利润敢于犯下任何罪行，帝国主义对拉美自然资源的掠夺就是明证。

这种地缘政治定位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深度的“去工业化”和“再初级产品化”，由此被死死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内部，与金融资本利益捆绑的本土统治阶级则持续削弱了我们自主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国家联盟等。

二、中国“十五五”规划：为拉美提供的战略契机

正是在拉美“第二次独立”斗争陷入困境、帝国主义压力空前加剧的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蓝图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涵。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五年规划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优势。回望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其“五年规划体系”具有突出的“从规划到执行到总结经验再到调整”的周期性逻辑，赋予了国家发展强大的动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与许多南方国家因屈从于外部压力和内部利益集团而导

致的政治经济不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使得任何长期的现代化计划都难以维系。

当前，“十五五”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①。这标志着一次关键的战略转向。这说明，中国不再停留于简单的“世界工厂”式的产能输出，而是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决定性跃迁。这一强大的“替代性选择”，正在重塑全球南方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为深陷“富饶的诅咒”和“再初级产品化”泥潭的拉丁美洲，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挣脱依附、实现“第二次独立”的历史性战略契机。中国为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替代性选择”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全球价值链的“解放”机遇。当“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国向高精尖的新质生产力迈进时，中国将逐步让出部分中端产业的生态位。因此，这为拉美等国家提供了摆脱“再初级产品化”、打破“富饶的诅咒”、实现“再工业化”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其次，发展模式的“替代性”范例。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规划性（而非以资本利润为中心的金融化），为拉美提供了可借鉴（而非机械照搬）的现代化路径。这是赢得“思想之战”的关键武器，雄辩地证明了在资本主义逻辑之外存在着可行的替代方案。

最后，南南关系的“非依附性”合作。中国所提供的南南关系，不附加制约他国独立发展的强加条件。这为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其得以与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建立互补的、非剥削性的经济联系，从而彻底摆脱旧有的“依附与从属”模式。

三、从拉美的自强到全球南方的联合

然而，能否真正把握这一战略契机取决于南方国家自身的政治意愿。就我们拉美地区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斗争将是艰难的。美帝国主义可以容忍失去亚洲和非洲，但绝不会容忍失去其“战略后院”。这决定了拉美将是“最终决战”的战场。因此，抓住中国提供的这一战略机遇，对我们而言已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选择，更是政治与生存的需要。

胜利的前提在于我们自身的自强与团结。这包含两个密不可分的层面。在区域内部，必须实现“自强自立”。拉美国家迫切需要重建并加强诸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一体化机制。这不仅是为了克服区域内部的经济不对称性，更是为了在这场地缘政治决战中“作为一个整体”发出声音，有效抵御美国的“最坏情况”图谋。在国际层面，必须实现“联合自强”。我们需要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②，这令我们无比振奋。这不仅是在政治声援，更是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的新发展格局将与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深度绑定。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5页。

综上，唯有通过内部自强（区域一体化）与外部联合（全球南方合作）的协同，拉美才能真正抓住“十五五”规划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将自己从美国的“战略后院”转变为一个自主、繁荣、真正独立的力量中心。而这才是我们在这场决定性的斗争中从抗争走向胜利的道路，也是拉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能作出的重要贡献。

[豪尔赫·阿尔贝托·科雷伊内斯 (Jorge Alberto Kreyness) 系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译者安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雷晓欢]

经济蓝图背后的政治逻辑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意涵、背景与全球价值

[西班牙] 胡里奥·里奥斯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经过四天的讨论与交流，现已闭幕。鉴于本次全会的核心议题为“十五五”规划，国际上的多数分析自然会聚焦于其所采纳的经济社会方针与战略部署。然而，若仅从经济维度解读此次全会，难以把握其完整意涵。在经济部署的背后，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所传递的政治信号及彰显的制度逻辑，更具深层次的指引价值。

一、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政治意涵

具体而言，本次全会的政治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维度。

其一，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不仅有力印证了中国制度体系的稳健性及其治理效能，也彰显了其成熟定型的治理模式。诚然，五年规划已是中国制度优势的明证，但更为根本的，是五年规划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制度性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展现了长远战略视野，其所蕴含的稳健性与韧性，更在当代中国卓有成效的实践中反复验证并赋予其优越性。在全球不确定性与对抗加剧的当下，中国制度的这一特质尤显珍贵。

其二，会议再次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凝聚和扩大社会共识的高度重视。这种共识是支撑集体决策、引导战略方向、审议通过重大文件的基石。广泛的协商与审议不仅催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更通过有意识地凝聚共识的努力，展现了制度效能。这一过程本身恰恰揭示了中国制度的核

心特质，即把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广泛参与和充分协商，与积极统一的高效执行深度结合。由此产出的治理成果，相较于其他制度，往往更具公信力与优越性。

需要强调的是，“共识”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与西方的多党对抗性政治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中华民族数千年政治文化传统中本就蕴含着丰富的“共识”理念，而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践创新，实现了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规划的研究与讨论的整个过程中广泛而又充分的协商与审议机制都在持续运作。这一过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非单向度的决断，而是通过制度化渠道充分吸纳各方意见，以寻求最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作为民主集中制的有机补充，协商共识机制为决策筑牢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治理逻辑清晰表明，“共识”在中国并非单纯的政治策略，而是其社会契约与制度安排的内在要求，代表着一种以团结、稳定和审议式决策为优先的治理模式，彰显出一种更加成熟、更具远见、也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智慧。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治理超大规模复杂国家的体系，但其运行机制却是由广泛协商所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一艰巨治理任务的核心依托，是一支信念坚定、勇于担当的党员队伍。这支队伍被赋予极高的道德与纪律标准，正如会议公报所强调的：“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证。”^①

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时代背景与战略回应

“十五五”规划在总体方针上延续了以往五年规划的连续性，但其历史定位独具特色。随之开启的，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一个由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全球领导者转型的决定性阶段。因此，分析本次全会召开的背景，对于理解中国设定的航向至关重要。

（一）从国内层面看源于中国迈向现代化新阶段的内在要求与战略回应

当前，中国正处在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兼具连贯性与长远视野的整体性战略，这为理解当前及未来五年规划的决定性意义提供了战略全景。在此背景下，“十五五”规划的制定，成为中国面对内外挑战进行战略“再调适”的关键节点，其核心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坚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均清晰地认识到当前局势的复杂性，深知实现目标任务艰巨、绝非易事。面对内需、房地产等领域的问题，其应对之道并非屈服于悲观论调，而是正视问题、积极应对，通过精准管理与疏导加以解决。

为回应上述挑战，“十五五”规划战略重点明确，总体方针是延续以往五年规划的连续性，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5页。

在关键领域则体现出决胜阶段的特殊性。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发展模式的界定实现了又一次飞跃。其核心在于确立了平衡增长、科技创新、共同富裕与生态保护的全新路线图，其战略意涵已远超单纯的可持续发展。正是这一深远的战略定位，决定了我们即将见证的不仅是中国的“持续发展”，更是“加速发展”：中国的远景目标直指2035年，届时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

其二，推动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以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此同时，农村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及国土空间协调，仍是中国共产党施政的优先重点。无论是提振内需、改善民生，还是迈向环境可持续，这些坚定不移的努力，都指向并再次确认了国家发展的既定航向。

其三，坚定不移推动高附加值增长。这标志着，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正将发展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以创新与科技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型固然殊为不易，但各级政府的工作成效已充分证明了其执行这一任务的专业能力与坚定意愿。这不仅有力驳斥了国际舆论的悲观预测，更预示着中国经济已为新一轮强劲加速做好了准备。

其四，着眼统筹发展与安全，在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中寻求战略主动。这集中体现为中国在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上的巨大抱负，以及同步保障发展安全、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坚定决心。

（二）从国际层面看源自日趋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次全会的召开并非孤立于国际体系动态之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竞争及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摩擦，构成了审议“十五五”规划各项讨论的宏观背景与关键变量。这一外部压力，使得新五年规划必须着力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强化国内供应链，减少对外部关键技术的依赖。

因此，在这一历史节点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其意义超越了制定规划本身，更升华为一次具有国际象征意义的战略行动：它旨在向一个剧烈动荡的世界，投射出中国独有的稳定性、延续性与领导力。

三、开启五年规划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中国共产党已经用事实和行动证明，规划是其治国理政的一项关键资产，其价值并非源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卓著的实践成效。无论是“唯市场论”还是“唯计划论”，都不可能让中国实现令世界惊叹的变革。中国对“计划”与“市场”的辩证统筹，本身即代表了一种价值无可估量的贡献。尤其是在“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西方市场经济体将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视为异端的背景下，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在深化市场开放的同时，非但没有削弱其根本制度，反而极大地丰富了其内涵。此举既超越了“计划还是市场”的陈旧二元对立，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强大韧性，以及对党的宗旨与纲领的忠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证明，无需改变自身制度本质便可驾驭市场。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规划已死”的悲观论调中，尤其在“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的冷战结束之后，中国

再次确立了制定五年规划的重要地位。中国制度的这一优势——在不将任何手段和方式绝对化的前提下，对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辩证整合的能力——与那些因“规划过时”而教条式拒绝它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形成鲜明对比。悖论在于，人们常在欧洲决策中听到的“这不可能做到”，在其他市场经济体中，远比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更为常见。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展现的高度稳定性与连续性，不仅印证了五年规划体系的强大效能，也证明其本身就是一项正确的战略选择。那么，一个新的五年规划的“黄金时代”是否正徐徐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成功——五年规划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对渴望摆脱那些滋生社会弊病的落后与不发达状态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使得规划正强化着一种新型吸引力。因此，这种吸引力的意义，远不止于让这些国家从中国已比肩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事实中获益，进而为南南合作创造新机遇；它更指向一个深层事实：中国成功的核心理念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建设同样不容忽视。

四、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性”意涵与全球价值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均标志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且常被冠以“决定性”的评价。这并非虚言，历次全会的决策最终都转化为具体的变革举措，推动中国一个台阶迈入新的阶段。具体到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这种“决定性”在两个层面得到了双重印证：其一，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擘画的路线图内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经济航向的掌舵者；其二，从其所处的全球背景来看，当前全球局势正深受可能长期化的不确定性制约，这也赋予了本次全会特殊的“决定性”内涵。

正因如此，五年规划不仅是中国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尤其在全球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不确定性之际，中国发布清晰的五年规划，其意义已超越擘画本国发展路线图本身。它在全球动荡中，投射出秩序、稳定与长远规划的清晰形象，以此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具备高效治理能力的执政党，中国的治理模式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依然保持强大的有效性与方向感。就此意义而言，此次全会释放的信号无疑具有深远的全球价值。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的坚实一步。此次全会传递的信息明确无误：中国已下定决心稳步实现其目标，并将以对风险和挑战的充分认知，深化既定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奋斗中，正步伐坚定、阔步向前！

[胡里奥·里奥斯 (Xulio Ríos) 系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站创始人、荣休顾问；译者周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规划的复兴与超越

——中国“十五五”规划及其全球意义

[巴西] 埃利亚斯·贾布尔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不仅将深刻形塑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亦与全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关联。

一、中国“十四五”成就与规划的复兴

苏联是最早实施“五年规划”的国家，其计划经济模式对后来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挫折，一些西方学者将其解读为社会主义缺乏可行性的证明。而中国的经验则扭转了这一论断，是中国的实践让历史回归应有的轨道，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是行之有效的制度。正因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中国的五年规划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高度期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净信贷提供国，以及 160 多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换言之，中国经济的未来直接影响着全球的供需结构。当前，中国正迈出重要一步，即在实现经济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努力成为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全球引领者。毋庸置疑，这对全球南方乃至全人类而言都是一个里程碑。试想，一个在 1949 年还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国家，如今正崛起为一个打破西方在科技创新领域垄断的国家！

诚然，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工具，计划亦非社会主义的专属特权。正是通过计划这一工具，人类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书写历史。与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巨大变革已经证明：计划及其制度框架“五年规划”，不仅造就了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奇迹，更在 21 世纪续写着新的辉煌。

“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成就斐然。在经济总量方面，GDP 从 2020 年的 103.5 万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约 134.9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 5.5%，稳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在创新驱动方面，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和太空探索等领域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为实现 2060 年碳中和迈出重大步伐，GDP 碳强度稳步降低。在民生保障方面，继举世瞩目地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稳定在 3000 万人以上，并为 600 多万有返贫风险的人口提供了专项支持。

这些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作为一个自主自强、物质基础不断丰厚的国家，中国为其人民生活条件的持续改善奠定了根本前提。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切是在美国形式多样的技术“霸凌”和日益加剧的国际不稳定局势下取得的，“十四五”规划期间的这些成就因此更显得来之不易。

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蓝图与核心任务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我们展现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图景的清晰脉络。

（一）核心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

《建议》明确了“深化改革”与“科技自立自强”的主线。这不仅是面对复杂国际形势的战略姿态，更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其目标非常明确，即将中国建设成世界重要科技中心和创新高地，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全球引领者。“十四五”期间的基础为此提供了可能。根据《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已首次跻身全球十大创新型国家之列。凭借全球最庞大的研发人员和科技人才队伍，中国正将其现代化议程的战略重心从“世界工厂”转向“全球创新中心”。

（二）关键领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落地需要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因此，“十五五”将继续扩大并巩固这一体系。实际上，“十四五”时期的成就已展现了这种潜力：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接近 1300 万辆；造船业在大型 LNG 运输船、航空母舰和大型邮轮的建造上均取得重大突破，这三项被誉为先进船舶制造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

（三）发展底色：推进“美丽中国”与绿色转型

高质量发展必然包含“美丽中国”的愿景。《建议》继续将绿色低碳转型置于中心位置。中国运营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最完整的清洁技术供应链，截至 2025 年，已建立超过 6300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在降低能源强度方面居于世界前列。

（四）发展根基：粮食安全与城乡融合

《建议》再次强调了粮食安全和农业强国建设。农业发展遵循着“主权”的逻辑，即确保粮食安全。2024 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6.954 亿吨，这为“十五五”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城乡关系上，“十五五”将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相协调。中国的城镇化避免了许多资本主义大都市发展中的矛盾。例如，“十四五”期间，中国年均新增城镇就业人口达 1300 万人。这种经济“机器人化”的显著进展与大规模就业创造之间的并存（例如，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已超过 200 万台，居全球首位），揭示了

一种超越“计划”与“市场”二元对立的、以国家规划驾驭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新型治理模式。

（五）统筹发展：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

共同富裕仍是“十五五”的核心理念之一。其目标是在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这需要“十四五”期间所积累的强大物质基础和科技能力作为前提。此外，《建议》突出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原则。这要求中国在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中，必须优先确保国家安全。因此，“十五五”期间，推进国防现代化、在人工智能和先进指挥控制系统等领域加大投入，将是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三、中国规划体系的运行机制

70多年来，中国的规划体系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改革。我将这一成功实践的成果，喻作一台“庞大的（前瞻）规划机器”。许多西方学者认为，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去计划”转型，而是从一种规划形式向另一种更具挑战性的规划形式的过渡。这种新形式的“挑战性”在于，它必须在一个与国际经济深度融合的环境中运行，这意味着规划体系必须在驾驭市场力量的同时，有能力抵御外部环境的失衡与冲击。

中国这种新形式的规划体系，已经构建了一种远优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这一体系根植于两大支柱，一是战略性生产资料和金融的公有制根基，二是由日益增长的技术（5G、大数据、AI等）与计算基础所提供的强大动力。这台“规划机器”的优越性在于：它使中国得以开启一波又一波的制度创新浪潮。一方面，这些创新为消除经济中未来的瓶颈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它们从根本上提升了国家的作用，开启了更新的、更高形式的经济规划。

综上展望，当“十五五”规划圆满收官之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这一高度，或将超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的预想，但毋庸置疑，它正化为一幅生动而坚实的现实图景，展现在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与进步的人们面前。

[埃利亚斯·贾布尔（Elias Jabbour）系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曾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办公室高级顾问、巴西利亚联邦区众议院议长办公室经济顾问等职；译者苏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宋丽丹]